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6)

第二章 讀書到苦方覺甜(下)

劉道玉

六、在郭和夫的研究室學習

在大學學習期間，遇到疑難問題時，我喜歡思考，對一些牛角尖問題愛深究，並且結合課程寫過一些小論文。但是，從嚴格意義上說，這還不是做研究工作，只是一種科學研究意識的萌動，至於如何做科學研究工作，我那時還是一竅不通的。

按照教學計畫的要求，我們最後一個學期是畢業論文時間，在畢業時必須完成一篇畢業論文。只有全部必修考試成績合格，畢業論文通過評審委員會的答辯，方可獲得合格的畢業文憑。那時沒有恢復學位制度，故沒有向我們頒發學士學位證書。

我們那一屆畢業生約一百八十人，要全部安排在校內作畢業論文，顯然是不可能的，既沒有實驗室也缺乏指導教師力量。選擇作畢業論文的單位必須專業對口，派遣學生去作畢業論文的校外單位大致是三種類型：一是中國科學院所屬的研究所；二是工業部門和地方性的研究所；三是其有一定研究條件的廠礦企業的中心實驗室。

我們那一屆畢業班，被派到中國科學研究所作畢業論文的只有兩個隊：一是趙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畢業論文實習隊；二是赴大連石油化學研究所畢業論文實習隊。我是被派往大連隊的隊長，這個隊共由五人組成，三個男同學，兩個女同學。一般說

來，學校對派往科學研究所的人選頗為重視，既要求政治上可靠又必須學習成績優秀，不僅要出色地完成畢業論文。而且規定不許出現任何紕漏。學校領導對我們說，你們學校派出的先遣隊，一定要作出最上乘的表現。你們既要為以後畢業班的同學去實習開路，更重要的是還要為今後畢業生源源源不斷地分到研究所工作建立信譽。

我們深知使命重大，決心全隊團結一致，虛心學習，刻苦鑽研，不辱沒校譽！

大連石油化學研究所創建於一九四九年三月，是國內歷史悠久和研究力量最強的科研單位之一。我被分配到當時該所第五研究室作畢業論文，該室主任是郭和夫先生，我的導師是張晏清博士。我記得，導師第一次會見我時，向我講明了大學生作畢業論文的意義；目的和要求。他說：「你們現在的角色，既是一名實習生又是一個研究人員，要把畢業實習與做研究工作結合起來，既要學習知識又要出成果。」

郭和夫先生並不具體指導我的畢業論文，但是

他作為室主任，對培養青年十分關心，我有什麼疑難可以隨時向他請教。他那時大約四十歲左右，漢語說得很吃力。他是郭沫若先生的長子。出生在日本，也一直在日本接受教育，解放後方回國工作。他為人十分謙虛，有一次我在圖書室碰到他，向他請教如何作科學研究，他很耐心地對我說：「作科學研究實際上就是圍繞著研究課題進行的，具體地說要抓好四個步驟：選好題、開好題、做好題和結好題。選題最重要，要有明確目的性、理論與實際結合，當前與長遠兼顧；開題是寫好開題報告，實際上是制定一個研究計畫的可行性報告；做好題就是通過實驗，實施其研究計畫，這是整個科學研究中的重心部分；結好題是出成果階段，整理實驗數據，撰寫論文或研究報告，鑑定研究成果。懂得了這些步驟，就掌握了作科學研究的基本要領，當然還有一個由淺入深的提高過程。」

根據導師的意思，我的畢業論文題目定為「硫化物和氮化物的對鉑重整催化劑中毒的效應」。這個課題是張老師的整個研究方向的一小部分，對於

改進汽油的質量，提高其燃燒值，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特別是當時我國石油勘探與開採十分落後，面臨著能源短缺的嚴重危機，我為能夠參加這樣具有明確應用目的的研究感到十分高興，這也是我在那裡廢寢忘食工作了一百卅五天的動力。

大連是一座美麗的海濱城市，其時正是大連的旅遊的黃金季節，那裏有旅順海軍基地、斯大林廣場等景觀，受蘇聯的影響較深，那時，我作為學生第一次出遠門，也是第一次到大連，但吸引我的並不是綺麗的風光和蔚藍色的海洋，而是大連石油化學所的科學研究條件和豐富的圖書資料，在四個月半的時間內，無論是平時或是星期日，我不是在實驗室就是在圖書館裡渡過的，甚至連旅順港我也沒有去參觀。惟一的一次奢侈，是去一家稍有檔次的照相館，租了一件西裝上衣和領帶照了一張畢業照，總共花了兩角錢，為那次在大連作畢業論文留下了紀念。

在導師的指導下，我刻苦努力，到六月底，我的畢業論文的實驗工作已告一段落，獲得了撰寫

論文所需要的實驗數據。按照導師的要求，我起草了一份畢業論文寫作提綱，經導師審定以後，我大概用了半個月的時間完成了論文初稿。經導師審改以後，我用複寫紙抄了三份，一份交研究室存檔，一份帶回交化學系作為學生成績入檔，我自留一份。按規定，研究室主任郭和夫先生還為我專門組織了一個論文答辯委員會，除我的導師張晏清先生以外，還有同研究室其他研究人員。答辯是按正規程序進行的，首先由我報告論文，重點是研究的目的、意義、實驗方向和研究的結論。然後，是回答評審委員和與會者的提問，我基本上都作了完滿的回答。最後，評審委員們肯定了我的工作，給予我論文「優秀」——最好的評價。

回校後，我向化學系領導匯報了我們的情況，受到了領導的表揚；他們認為我們出色地完成了畢業論文實習任務，為學校爭了光。我的論文《硫化物和氮化物對鉑重整他劑中毒的效應》發表在《武漢大學學報》（自然科學）一九五九年第五期上，是同屆畢業生中達到發表水平的為數不多的論

文之一。

通過畢業論文實習，我的最大的收穫是認識到科學研究在本質上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一個合格的科學研究人員，必須具有開拓創新的精神，樹立嚴謹的科學態度，能夠掌握各種實驗技能，具有熟練地駕馭文獻資料的能力。這是從實踐中體會來的，對於我科研素質的養成，為以後從研究工作 and 研究生的學習打下了初步基礎。每當我回憶往事時，對於大連石油化學研究所的那一段實習生活，總是懷有美好的回憶，那裡的確是我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搖籃。

七、政治運動中的角色行為

我們那一撥上學的大學生，正值社會主義建設過渡時期，其間形勢多變，政治運動頻繁，如「三反」、「五反」、「肅反」、「反右派」、「大躍進」運動等。這些運動不僅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了學校正常的秩序，而且對我們的思想也產生著深刻的影響。

一九五五年夏初，《人民日報》陸續公布了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毛澤東在這些材料的按語中指出：「胡風分子是以偽裝出現的反革命分子，他們給人以假象，而將真相隱藏著。」「過去說是一批單純的文化人，不對了，他們的人鑽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裡。」「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復興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目的。」根據當時中央的批示，很快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場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接著又轉入到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

高等學校歷來被認為是階段鬥爭的「晴雨表」，鑑於武漢大學是一所歷史較長的老校，有不少的教師和職員是從國民黨時期留用的，於是武漢大學也就很自然地成了肅反的重點單位。在中央的通知下達後，武漢大學立即成立了肅反領導小組，並決定從幹部和大學生中抽調一〇%人脫產專職從事肅反工作，我也是那次被抽調的脫產「幹部」之一，條件停學一年，延長到一九五八年畢業。

面對學校黨組織的決定，我內心是矛盾的：一方面，感到這是黨組織的信任，有一種光榮感，能為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作一份貢獻是義不容辭的；另一方面，又怕丟了學業，推遲畢業時間，這與我「三級跳」式的學習經歷各超前的個性是相悖的。特別擔心在肅清反工作結束後，把我們轉為政工幹部，這又與我要當諾貝爾式的發明家是矛盾的。經過思想鬥爭，我服從了黨組織的決定，因為那時我已寫了入黨申請書，表明自己願意做一個共產黨的忠實追隨者。

作為一名普通的肅反幹部，我對學校肅反工作的全局情況完全不了解。那時，肅反工作分成了辦公室、專案組、材料組、外調組等，我被分配在外調組，由於有嚴格的保密規定，所以我對其他各組的情況也一無所知。據後來的統計材料稱，那時立案審查和被批鬥的人共七十三人，約占教職工人數的八%，這遠遠超過了毛澤東關於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三的估計。外調組的工作猶如採購組一樣，我們根據材料組或專案組提出的調查提綱，找相關

人調查，索回他們所寫的並由其所在單位黨組織簽章的證明材料。外出調查一般是一個人，有時也有兩人同行的，但大多時候我是一個人執行任務。在調查中，如果是公職人員問話，一般有該單位有關人員參加；如果要提審在押犯人，我們只能把調查提綱交給監管人員，由他們提審，我一般不能參加。總的來說，調查工作是順利的，完全是按政策行事的，但也有時遇到證人亡故或線索斷了的，這樣就不得不無功而返了。

那時，交通、電信很落後，外調工作十分艱苦。在長達一年的時間內，我去外調的地方涉及到湖北、河南、湖南、江西、廣西、廣東六省三十多個縣一百多個單位。在湖南的零陵、新北、洞口等縣，只能步行翻越陡峭的山峰；在廣西的縣城，只能坐人力單車；在河南，由於糧食統購統銷引起的供給緊張，有時吃不上飯餓肚子。

一九五六年五月底，我在海南島外調時遭遇了一起搶劫事件，一天夜裡，我住在海口市的一家旅店裡，在朦朧之中，我似乎感覺到有一個人已

拉開了我的蚊帳，等我睜開眼後，他右手拿著一把明晃晃的刺刀，左手已經拿到了我放在枕頭邊上的掛包。我一骨碌爬起來，大聲喊道：「抓強盜，抓強盜！」那人聽到我的呼喊，奪門而逃。我也立即跳下床，光著腳追了出去，心想：那掛包裡除了旅費以外，最重要的是外調材料和學校黨委的空白介紹信，這是機密呀，絕不能丟失！於是，我窮追不捨，一直追到一條街的盡頭，在巡夜的士兵的幫助下，制服了搶劫者，我索回了掛包，沒有遭到損失。經初步審訊，那人是一名正在被追尋的逃兵，後來由巡夜士兵帶回去處理了。

在脫產肅反期間，我是盡職的，特別是在外調中吃苦耐劳的精神，贏得了好評。於是，一九五六年三月八日，我被批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時，在肅反運動結束時，我被評為湖北省高等學校肅反積極分子，受到湖北省高校工委的嘉獎。

脫產肅反，雖說耽誤了一年的學習，但我受到了鍛煉，特別是從事社會調查和獨立工作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在肅反期間，學校每月發給我們

三十六元，相當於大學畢業生實習工資的八五%。那時大學生沒有任何打工的機會，如果有勞動的話，那也是義務性的。對於完全沒有經濟來源的我來說，這一點微薄的收入是很珍貴的，我在武漢展覽館花三十元買了一塊蘇製「勝利」牌手錶，買了雙皮鞋和一件布棉襖，這是當時奢侈的「三大件」。此外，節餘下來的錢，是我未來兩年學習期間的零用錢，一直維繫到我大學畢業。

一九五六年暑假以後，我和絕大多數肅反幹部歸隊學習，我被新編到化學系八五一班。大約歸隊半年，我們剛剛安定下來學習，一場更大的政治鬥爭已經箭在弦上了。

一九五七年四月廿七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批示》的通知，號召民主黨派人士和人民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所謂整風，是號召黨外人士用「和風細雨」的方式，批評黨員幹部身上存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以端正共產黨幹部的作風。但很快，整風運動就轉向了對群眾中的右派分子的大揭發、大批判，從而揭開了反右派

鬥爭的序幕。

反右派鬥爭開始以後，我作爲一個黨員，自然地成了左派，是反右鬥爭的積極分子，武漢大學的反右鬥爭從六月到十一月底共六個月，分爲群眾發動、揭發批判和甄別定案三個階段。那時，全校的重點是揭發批判中文系的「右派司令」、「右派元帥」和法律系的「中山宰相」。此外，每個系有自己的批鬥重點，每個班也有對象。全校共劃定右派分子四二九人，在全國高校中劃得比較多的學校之一。我所在的八五二班，通過排隊初步列出了右派和「中右」共五人，最後正式定爲右派分子的只有兩人。一個是調幹的女生，她自己參加過三青團，其丈夫是江西某高校的畫家、「鳴放」時對肅反發表了一些看法。另一個男同學，平時比較自由散漫，在思想上同情北京民主人士鳴放的觀點。那時我的思想狀況是：一方面對反右鬥爭是積極的；另一方面又認爲右派沒那麼多，我們班上另外三個同學就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我力爭把他們保了下來，其中一名是香港回內地求學的。

在反右鬥爭中，我作爲黨員承擔了班上反右領導小組的組長工作，對反右鬥爭是很積極的，對於我們班上兩名同學被劃爲右派分子，我負有重要的責任。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作出了平反冤、假、錯案的決定，這時我已擔任了武漢大學的校長，出於對歷史負責，爲了把當年受到傷害的所謂右派分子從不平等的待遇解脫出來，我親自抓爲右派平反工作。我要求做到：哪怕是踏遍千山萬水，也要找到每一個受到傷害的人的下落。一定要徹底平反不留尾巴，同時還要爲協助當地組織安排好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凡是工作無著落又有一技之長的，一律調回學校统一安排工作。在這次平反中，我也十分關心受到傷害的兩位同班同學，也爲他們徹底地平了反，向他們表示了我的歉疚，希望他們在未來的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

在大學期間我所經歷的最後一個政治運動，是「大躍進」，無論是規模上還是破壞程度上，它都超過以往的任何運動。

那的確是個缺乏理性的年代，浮誇風、瞎指揮

風、共產風盛極一時！

具體到大學來說，重點是開展教育大革命。從一九五八年四月開始，武漢大學提出了一系列的口號和措施，如「撥白旗」、「插紅旗」，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破除教學中唯心主義思想體系，大辦校辦工廠，「紅」與「專」的大辯論……霎時間，武漢大學成了教育革命的一面紅旗，其經驗迅速地通過媒體傳遍了全國。因此，引起了毛澤東主席的重視，他於當年九月十二日親臨學校視察。接見了武漢大學等校兩萬多名學生，發表了被稱作「九·二指示」的重要講話。這是一種巨大的鼓舞，是對那時正在進行的如火如荼的教育革命的肯命。

正當學校的教育大革命處於高潮的時候，我卻像一隻蝸牛，蝸居在科學院研究所這座象牙塔之中，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攻畢業論文。但是，通過報紙和同學們的通信，我對學校發生的事還是大體上知道的。我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對媒體不斷介紹學校教改的經驗感到高興，這無疑擴大了

學校的名氣；另一方面，對「大躍進」和學校教改中的某些做法又有些懷疑，如湖北省某縣放出了畝產七萬多斤的高產「衛星」，武漢大學的某些系提出要批判牛頓三大力學定律，破門捷到夫元素周期律等。那時的湖北省和武漢大學，在「大躍進」中左得出奇，猶如一對「母子衛星」，在全國很是耀眼。

從大連回到學校以後，雖說畢業論文受到了表揚，但黨組織認為我脫離了學校的革命形勢，需要「補課」。所謂補課，就是「務虛」，在黨支部的會議上，要我亮出對「大躍進」和教育革命的「活思想」。本著對組織忠誠老實的態度，我表明了對「大躍進」浮誇的看法，表明不同意一些違各科學的口號，也談了對「又紅又專」的困惑。針對這些「活思想」，組織上認為我跟不上形勢，存在單純業務觀點的右傾思想，科學院資產知識分子影響太深，要求我立即轉變立場。並要在以後的行動中接受考驗。

學校教育革命最後一個戰役是「擂台比武」，

我正好趕上了。學校以為，教育革命到了開花結果的階段，號召過一個革命的暑假，通過學生與老師「擂台比武」的辦法，編出革命化的教材。化學系確定編寫《無機化學》、《分析化學》、《有機化學》、《有機化學》四門新教材，以畢業班的學生為主體，成立四門課程編寫戰鬥司令部，挑戰擔任這四門課程的教研室的教師。我被分配在無機化學戰鬥司令部，任司令員，與無機化學教研室的老師打擂台，雙方各編出一本教材，通過辯論以定輸贏。我們仗著革命氣盛，人多勢眾，聯繫實際內容豐富，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學校領導的支持，贏得了表面上的勝利。其實，教師對我們的勝利並不服氣，只是在高壓下不敢言明罷了。在以後的教學實踐中，他們依然用自己的教材。

回憶大學時所經歷的一系列的政治運動，總為我那時矛盾的心態而感到一種苦澀的隱痛。我本立志要當一個科學家，但又拼命地緊跟各項政治運動，生怕成爲落後分子；我本惜時如命，但又義無反顧地參加防汛搶險隊，脫產參加肅反；我雖贊成

「鳴放」，反對「三風」（指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但又積極參加反右鬥爭，把自己的同學打成了右派分子；我雖崇尚尊師重道，但在教育革命中又批判過自己的老師；我雖懷疑高產「衛星」，但也高呼「三面紅旗」萬歲！我雖不知「又紅又專」的標準是什麼，但我卻表示堅決走「又紅又專」的道路等等。

上述種種矛盾的心態，曾困擾著我，使我痛苦過，但也有沾沾自喜的時候。它們的產生，既有時代的特徵又有性格內在的原因。我們每個人都是由獨立行爲的我和角色行爲的我所組成，在那，「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我也要執行」的年代，獨立行爲是難於表達的，僅僅只能履行角色行爲而已。

我當然也不例外。

八、諾貝爾獎牌擋不住丘比特神箭

大學生青年男女談戀愛，果真會影響學習，會出現麻煩嗎？這個問題，至今仍然困擾著大學領導

管理部門，要不然爲什麼時至今日，還有很多大學明文規定大學生不准談戀愛呢！

但是，二十世紀五〇年代中期以前，是一個令人難忘的開明的時代，既沒有限制大學生談戀愛的硬性規定，又沒有專職政治輔導員的監管，那時，大學生戀愛完全是自由的，有的一進校就確定戀愛關係，成雙成對地出入教室、圖書館；有的在畢業前敲定終身；有的表示先立業後成家；但也有有的還可以申請結婚，甚至個別女生可以休學生孩子。那的確是一個寬鬆的時代，大學生們基本上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這是一種超前的符合現代精神的辦學理念。歷史經驗表明，在對待大學生談戀愛這個問題上，宜疏不宜堵，隱藏的地下活動比公開的活動更具危險性。

其實，大學生的學習與談戀愛，就猶如音樂上的協奏曲，如果協奏好了，不僅可以對學習產生一種「核動力」，而且還會營造快樂和幸福的人生。

剛剛進大學的時候，我的確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決心排除一切雜念，集中全部精

力搞好學習。同時，我非常崇拜發明大王諾貝爾，也決心效仿他終生不娶。這是我真實的想法，那時在同學們當時已不是什麼秘密了。當時，我爲什麼會有這種違反常理的想法呢？是不成熟，是無知，抑或是受到禁欲主義的影響？原因比較複雜，可能各種因素都有一點。那麼，什麼時候我開始轉變對戀愛的態度，產生愛戀之思的呢？那是大四上學期開始的，一般規律是大學畢業那一年是戀愛的高峰期，因爲如果確定了戀愛關係，畢業分配時可以要求組織上照顧分配在一起。存在決定著思想意識，內在的需要是行爲的驅動力。正是在這種客觀形勢的刺激下，我對待戀愛的態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從「年輕人不知深淺亂發誓」回歸到理性的心態。凡是有男女的地方，如果有著「親密的接觸」，就可能產生愛情，即使不是相互的愛慕。那也會是單相思。我的戀愛就是在這種長期的共同學習中產生的。

我和高偉的戀情似乎是天意安排的。一九五三年進大學後，我倆同時被編入七五二班，我是班

長，她是校團委委員、團支部書記；一九五五年肅反時，我倆同時脫產做肅反幹部，她在材料組，我在外調組；肅反結束歸隊時，我倆又同時被編入八五二班，我們雖然不再當班幹部，但我倆作爲班中僅有的兩名黨員，共同參加班上各項工作的研究決策；大四分專業時，事前我們雖未交換意見，但我們不約而同地都填報了高分子化學專業，大學畢業分配時，盡管我們各有追求，但我倆又同時留校當教師。這一切都似乎是月老在爲我們牽線，天公爲我們作美！

從進大學開始，我對高偉就有著極好的印象。她紮著一對一尺多長的烏黑的辮子，臉上兩個甜甜的小酒窩，穿著陰丹士林的工裝褲，一雙帶襪的黑布鞋和白色的短襪，充分展示出女性青春活力的美，特別是她開朗的性格，積極向上的熱情，良好的群眾關係，善於做社會工作的能力，給同學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她愛笑，笑得很甜、很爽朗，往往是未見其人先聞其笑聲。因此同學們給她起了一個渾名叫「鴉雀」。正是由於她的這些優點，所以

引起了許多男生的愛慕。據我所知，無論是系內或者系外，有不少男生向她求愛，她似乎沒有什麼回應。

我對她產生愛戀是從大四開始的，說實話那時我完全沒有自信，心想，她是大城市的小姐，而我是個土得掉渣的鄉巴佬；她算得上是書香世家的閨秀，而我是農民的兒子，差距實在太大了。更何況已有那麼多的求愛者都未能得到她的芳心。豈能輪到我？盡管我們在學習與工作上有過頻繁的接觸，但是在兒女情長這個問題上，那時我根本沒有勇氣單獨約她敞開自己的心扉。

在大連畢業論文實習期間，我有機會給她寫信，試放出我對她愛戀的氣球，幸好她沒有拒絕。當然，這並不是偶然的，而是以我們多年同窗情誼爲基礎的。在那一段時間內，我們鴻雁傳情，我去她來，每兩周我要給她寫一封長信，讓我們的愛情達到高潮。畢業論文結束回校後，我也就大膽地約她散步，她也邀我到她家裡去玩，很快我們的關係公開了。



蘇小妹曾以吟詩三試她未來的夫君秦少游，有趣的是，我也接受過高偉類似的「考驗」。

那是一個清風明月的夜晚，我們相約來到東湖畔的一個叫做「元寶山」的小山上，相依而坐，相互傾訴著對未來的憧憬；她突然推開我，問道：

「唉，還有一個問題你要說清楚，你到底是效仿諾貝爾當和尚還是要結婚？」

「我崇拜諾貝爾，但我要結婚。」
「那是為什麼？」

「因為諾貝爾是陽性，同性相斥，異性相吸呀。諾貝爾的獎牌擋不住丘比特的箭呀！」

「左說右說都是你，我不與你狡辯。」她說。

我們又相依偎依在一起了。自那以後，我們相互關心，互相支持，共同經歷了四十二年的風風雨雨！我們結婚四十週年「寶石婚」紀念時，沒作任何聲張，既沒有鮮花，也沒有珠寶相贈，是在非常平淡中度過的。爲了紀念這個不平常的日子，回憶四十多年的恩愛，我填詞一首以示感念：

長相思（東湖水）

東湖水，東湖亭，

十個春秋煉愛情，恩愛情意深。

文革新，改革雲，

患難與共心連心，甘苦伴終生。



九、「白手起家」搞科研

大學畢業後我留校當教師，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元素有機化學研究室，專職從事科學研究工作。這個研究室是根據曾昭掄先生的倡議而成立的。他原是北京大學化學系一級教授，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國家高等教育部副部長，一九五七年被錯劃為全國大右派分子，經李達校長同意，被下放到當時被稱為最革命的武漢大學接受改造。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這都是一件好事，對曾先生來說，他可以進行作爲一個學者想從事的學術研究工作；對於我和一些他的助手來說，我們可以受業於名師，在他的指導下從事科學研究。

解放初，徐懋庸被派到武漢大學擔任校務委員秘書長，實際上他掌握了武漢大學的黨政大權。由於他推行了極左路線，對知識分子採取了過火的鬥爭，雖然他於一九五三年被撤職，但卻使武漢大學傷了元氣，其不良影響是很深遠的。當時武漢大學的科學研究是很落後的，教師只搞教學而不敢搞科

研，以至於絕大多數教師心甘情願地當個教書匠。因此，無論是在科學研究的指導力量上，在學術研究的積累上，或是在科學研究條件上，幾乎都是「一窮二白」的。特別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破壞，使得原材料匱乏，工業品供應緊張，人民生活極度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搞科學研究，無疑是一切都得從零開始，真可謂「白手起家」搞科研。

元素有機化學是當時國內剛發展的一門新興學科。它的許多研究方向，都與國防尖端技術密切相關。開展元素有機化學研究的某些研究課題，所需要的條件是苛刻的，除了涉及到低溫冷凍的技術、高溫高壓技術；無水無氣操作技術以外。還需要一些特殊的原料、單體和化學試劑。然而，在當時國內，既沒有這些技術設備的銷售，又沒有此類化學試劑的生產供應，一切要靠「自力更生」。打個粗俗的比方說，那時做科研工作就是好比要吃紅燒肉必須從養豬開始做起一樣。

元素有機化學研究下設五個科研組，有機氟化學研究組是最先起步的一個小組，我畢業後就

受命組建這個組，並擔任組長。當時，被稱爲「塑料之王」的特氟隆（學名爲聚四氟乙烯），在國外

已研製成功並投入大規模生產，由於它具有高低溫、耐腐蝕、耐磨等優越的性能，所以它被應用在國防尖端技術中。根據科學研究要爲國防建設服務的指導思想，曾先生建議我們研究聚四氟乙烯的合成。當時，我們科研組只有三人，開展這項研究所需要的一切設備和原材料都沒有，我們不得不從採購原料開始。研究工作需要電解槽和高壓釜，買不到，就找工廠加工定做。但是製造這些設備需要紫銅和不銹鋼，而這些材料是屬於計畫分配的緊銷戰略物質。爲了得到這些材料，我們不得不周旋於計委和物資部門之間，有時甚至要找到各級領導簽字或批條子，但是終究還是解決不了，因爲「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呀。那時，中國處於令人難於想像的困境，婦女買不到髮卡，學生買不到回形針，嬰兒沒有奶粉供應。教師和學生只能上半天班。下午要靜躺在床上以減少能量消耗，這叫做「抓革命保健

康」。這種情況下，我無謂地浪費了一年多的時間，最後不得不停止了這個課題的研究。

一九六〇年初，我與曾先生商量，擬開展含氟航空滅火的研製，雖然也存在設備技術上的困難，但經過努力有望可以得到解決。這時科研組已增至五人，經過全體人員的努力，當年秋天已完成了實驗的合成，準備進行毒性、腐蝕性和滅火試驗，同時進行擴大中間試驗，爲批量生產和推廣應用奠定基礎。至一九六五年，這一切試驗工作均已完成。證明它是一種無毒、無腐蝕和高效的航空滅水劑。可惜的是，正當化工部準備投資建廠時，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使這項研究成果被推遲了八年。直到一九七七年，才恢復研究，建立了小批量的生產工廠，以「九·十二」命名的含氟滅火劑，廣泛地應用在航空、航海和油田的滅火上。該項成果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填補了國內的空白，榮獲一九七八年全國科學大會一等獎。

（未完待續）